

容許王丹來港才是破壞「一國兩制」

蕭何

王丹日前在台灣所謂的記者會招待會，以及他在申請來香港的高調宣傳，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衝擊和挑戰的姿態。他的動機和目標就是要利用香港作為活動基地，通過喪禮搞政治，要配合民主黨和「支聯會」的政治鬥爭，要「結束一黨專政」，挑戰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種行為的本身，就是「井水犯河水」。從張文光到王丹，都說「一國兩制」蕩然無存，王丹更加高調發表聲明，宣稱「一國兩制是騙人的謊言」。很明顯，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發動對「一國兩制」的攻擊，阻撓兩岸的和平統一。



■作者認為，王丹日前在台灣所謂的記者會招待會，以及他在申請來香港的高調宣傳，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衝擊和挑戰的姿態。他的動機和目標就是要利用香港作為活動基地，通過喪禮搞政治，要配合民主黨和「支聯會」的政治鬥爭。圖左為吾爾開希。

最近，民主黨、支聯會、教協進行了三位一體的策略，不斷利用劉曉波事件、司徒華喪禮進行連串的活動，在每個小選區舉行了追悼會，向學生宣傳劉曉波企圖改變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主張，支持「民運」，並且企圖把間諜分子王丹引入香港，大搞政治活動，攻擊「一國兩制」，攻擊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攻擊中央政府，作為主導今後四場選舉的議題，構建選舉工程。

不容王丹來港搞事

所謂不招待記者，不入住酒店，不搞政治活動的王丹承諾，早已經在報紙版面高調宣傳，其實本身就是一種以輿論作為壓力的鬥爭策略。這不過是為了讓台灣の間諜和「民運分子」可以來香港參與政治性的葬禮打開缺口，以後就可以經常大搖大擺進入香港。

王丹日前在台灣所謂的記者會招待會，以及他在申請來香港的高調宣傳，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衝擊和挑戰的姿態。他們的動機和目標就是要利用香港作為活動基地，通過喪禮搞政治，要配合民主黨和支聯會的政治鬥爭，要「結束一黨專政」，挑戰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種行為的本身，就是「井水犯河水」。從張文光到王丹，都說「一國兩制」蕩然無存，王丹更加高調發表聲明，宣稱「一國兩制是騙人的謊言」。很明顯，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發動對「一國兩制」的攻擊，阻撓兩岸的和平統一。

在司徒華生前的時候，到了美國紐約，王丹懶得去見他。司徒華死了，王丹卻熱情得很，立即要飛來香港。區別在什麼地方，區別就是在紐約見面沒有一個入境的效果，在香港則有，通緝犯、間諜要突破「一國兩制」，要回到內地搞「民運」，配合美國的策略，就要在香港尋求突破。不能入境，就破口大罵。王丹與司徒華非親非故，司徒華死了，立即自認是親密戰友，相當令人奇怪。王丹的意圖，就是要為自己尋求一個合法來香

港進行政治活動的身份和地位，要利用行政長官也在現場的場合，共聚一堂。這是「民運分子要回家鬧革命」的一個投石問路。所謂不高調宣傳，不作高調政治活動，通通都是假話，日前王丹的行動就非常高調，就充滿了政治色彩。

反對派正是「井水犯河水」

「一國兩制」的原則，是不企圖改變對方的政治制度。香港直轄於中央政府，香港是高度自治的特區，但絕不是完全自治的特區，香港特別行政區仍然要遵守其法律地位和義務。《基本法》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要維護國家的安全。

任何間諜分子、顛覆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分子，都不可以在香港搞搞震，香港不是海外「民運分子」的活動基地。「支聯會」企圖和海外的「民運分子」合流，進行掩護提供方便，明顯破壞了「一國兩制」的互不干涉、互不顛覆的原則。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更針對「特區政府會很好地處理這事」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指王「言而無信、言不由衷」。但他完全忘記了王光亞「井水不犯河水」的言論。

拒王丹來港是個好決定

李民理

王丹不來香港了。——正確一些說，王丹是不能來香港了。為甚麼？因為香港入境事務處不批准。好！這一決定，利國利港利民，是大好事，值得大眾報以掌聲。

王丹此人，姑且勿論他現在是不是「民運分子」，此人至少是個「麻煩友」。舉例說，王丹說，他是華叔親自「救」出來的，所以一定要來香港。首先，感恩應源自心底，報恩可以有種種方式，而不必拘泥於上香「作秀」。其次，倘若上完香就「恩了情了」，豈不是簡單到極？其三，王丹要悼念華叔，不一定要來香港，在台灣也可以，在美國也可

以。在被拒入境香港之後，王丹大發牢騷，表示憤怒，說是在政府保護之下入境幾小時，難道會損害香港的穩定？香港這樣的穩定豈不是太脆弱了？王丹的說詞，偷換概念，本末倒置。王丹一人之來去，又怎能與香港的穩定作對照？蠅頭之光又豈能與日月爭輝？王丹不但不自量力，實在也太夜郎自大了。舉世頭號強國的美國，也常有將不受歡迎人士拒之於門外的例子，難道說，美國的穩定也脆弱了？

有人一直拿王丹能否來港「說事」。王丹若來港，自己可以「三不」、「四不」，包括不說話暫時扮啞巴，但必定有許多會充任王丹代理人，他們可以大說特說，可以拉一百個王丹說得還多，更可以拉王丹做大旗，搞出許多的小動作或大動作。如此這般，在一段時間內，香港又豈有寧日可言？

因為特區政府不批准王丹來港，竟有人上綱上線，指「一國兩制」蕩然無存。這些人是否「發嗶風」？難道說，對國家不利之人，對香港絕無好處之人，香港要恭請他入境，才算是「兩制」？如此思維，不但荒唐，兼且荒謬。王丹要悼念華叔，請在台灣上香吧！

認真思考和研究中國現代化的深層問題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2011年春節即將來臨。以中國人的傳統來說，這是一個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時機。而2011年，既是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又是中國「十二五」規劃開局首年，同時更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似乎注定了這一年要有所交匯，也給了本身處於急劇轉型之中的中國一個梳理和思考的契機。

世紀風

當前中國的三大轉型

由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在中國已歷經三十二年。從中國近代史上看，改革開放其實是十九世紀中葉洋務運動之後的中國第二次現代化努力。無論從追趕西方的雄心，還是從富國強兵的目的，甚至是和平改良的手段，改革開放與洋務運動都有不少相似之處。然而，洋務運動全面失敗，改革開放則基本成功，其間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從洋務運動失敗到改革開放開啟的八十多年，是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中華民族仁人志士，嘗試用革命手段拯救苦難深重的祖國而走過的一段曲折之路。

歷經三十二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對內經濟水平和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對外則迅速崛起，但同時也面臨三十二年前所無法預計的、更高層面上的問題和困惑。這些問題基本上來自三大轉型：一、中國正迅速從農業國轉向工業國，人類歷史上工業化開啟二、三十年後必然經歷的城市化艱辛，似乎正在由中國複製，其間產生的農民工問題、暴力拆遷、工人維權、貧富不均等，正在成為緊迫的社會問題；二、中國正在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但由於原有體制尤其是傳統文化思維的因素，這一轉型尚不徹底，市場、政府和法治三位一體、各司其職的關係尚未形成，由此出現的腐敗盛行便集中折射了這一轉型的困惑；三、中國正迅速從一個封閉社會轉型成為多元、開放的社會，人民的權利意識上升，多元利益結構需要並探尋表達和博弈的平台。

上述三大轉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都進入各自的瓶頸階段，以至於今天的中國在許多方面呈現出成就與問題賽跑、經驗與困惑並存的局面。面對這些由瓶頸導致的問題和困惑，中國社會似乎出現了改革共識出現分歧的情況，無論是對進一步改革不力的指責，還是在穩定名義下的暫時迴避，其實都折射了某種程度的迷茫。實際上，今天中國最需要的是進一步凝聚共識。然而，凝聚共識不易實際上來自於對未來的迷茫；而對未來的迷茫，一定程度上又來自於對已走過道路的缺乏梳理。

鄧小平曾有一句名言：「摸着石頭過河」。這自然就是改革開放之初而言；然而在改革進行了三十二年之後，中國則不應該繼續「摸着石頭過河」，而應該探尋中國現代化的一些深層邏輯，並使未來的道路走得更为清醒、自主和穩健。

中國改革的三大終極問題

關注中國的改革，有三大終極問題不可迴避：一、導致中國三十二年改革基本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什麼？二、如果說改革是從此岸過渡到彼岸，那麼改革的彼岸到底是什麼？三、中國的改革之舟目前處於從此岸到彼岸的哪個階段？

就上述第一個問題而言，雖然中國改革開放成功有眾多因素，但最重要的無疑是開啟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其原因有兩個：首先，從市場經濟原理而言，經濟本身就是市場上的個體行為，因此個體永遠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其次，從中國近代史上首次現代化的嘗試——洋務運動來看，其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官辦經濟無疑是洋務運動在經濟領域裡失敗的主要原因。

鄧小平的偉大不但在於開啟了改革開放，而且還在於摸到了從中國歷史和經濟規律而言都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金鑰匙」，把創造財富的權利完整地交到了民眾手上。更重要的是，這一舉措顛覆了中國文化千百年的思維和行為定式，那就是以「富國強民」、「富國強兵」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代表的家國觀念。

客觀地看，中華文化的某些深層基因，一定程度上與市場經濟的深層邏輯存在悖論。市場經濟強調個體行為，注重個人權利，崇尚契約精神和法治，這些似乎都是中華文化的深層基因所缺乏的。當然，華人具有經商和致富的原始潛質；但一旦達到經濟活動的制度層面，原有的思維定式就會產生負面作用。因此，中國的改革實際上已經開始與傳統文化產生摩擦的階段。

這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強調政府與市場的分離和各司其職，同時又強調法治的獨立監督。這在今天的中國顯然還沒有做到，而且政府職能轉型步履維艱，既有政治體制的原因，也有深層文化基因的因素。

因此，中國的三大轉型都呈現出某種程度的「非典型」特徵，繼而固化成為當前的瓶頸。瓶頸當頭，中國各階層的人們需要的不是指責和施壓，而是沉沉心來，既從改革本身的專業原理，同時也從中國自身文化基因入手做一些梳理。文化的梳理和沉澱需要時間，但它若能成為中國社會有意識的行為，其進程和效果都會大不一樣。

「五四運動」的前輩曾提出「器物、制度、文化」的命題，這一命題至今仍因惑著中國的改革。

中國改革需長久探索

中國改革的彼岸更是一個需要持久探索的問題。過去數百年，現代化在西方土壤上得以成功，其保障框架主要是個人權利保護、法治和以選舉為特徵的政治民主。中國到底是拿來主義還是尋求創新？適合中國化的現代化保障框架到底是什麼？

另外，若以物質現代化、制度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來區分現代化的階段性進程，那麼中國目前正處於從物質現代化到制度現代化的交界處。更苛刻地說，如果說三十年的物質現代化在中國只是基本解決了溫飽和不平衡的富裕，那麼作為物質現代化的第二階段，現在正是建構平衡發展、公平正義的轉折點；而對制度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的探索，在中國則遠遠未開始。從這個意義上看，稱中國的現代化只走了四分之一的道路，已經是一個十分寬容的說法了。

今天的中國，一方面需要凝聚共識，另一方面需要對中國現代化的深層問題進行扎扎實實的思考和研究，兩者均不可偏廢，而且都已到了需要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了。

用中國文化消弭中美矛盾

張敬偉

胡奧會，是中美關係的分水嶺，也拉開了世界權力新格局的序幕。在這場由中美兩國領銜主演的全球化大戰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對中國實力的確認。就像《時代》周刊1月20日所述，在新世界經濟秩序中，我們將看到由中美共同支持的惠及所有人的全球化新舞台。同時，該刊慨歎，「新興世界正迎頭趕上，華盛頓和倫敦對此無能為力。」

美國對華崛起抱有猜忌焦慮

這種舊帝國對新強國的複雜情緒，如果從消極的宿命昇華為積極的接納，倒不失為雙贏的選擇。畢竟的是，在美國人的視野裡，滿眼看到的都是中國硬實力的強大。雖然因為利益而不得不和中國接觸，但從靈魂深處充溢著對華的擔憂、驚懼、猜忌、焦慮，下意識地將中國視為威脅。於是，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地緣等各個層面對華採取混亂不堪的政策，使中美關係游移於敵友之間。就在白宮給予胡錦濤盛大歡迎儀式，胡奧二人航籌交錯之時，希拉里國務卿面對中美是敵是友的媒體追問而給不出答案。

若美國永遠糾結下去，不僅無法阻遏中國的崛起，而且會使中美關係重蹈歷史上強國間零和博弈的怪圈，老帝國自討苦吃一蹶不振，新強國從血戰中前行強大。如何破解中美關係的這種潛在隱憂，除了政治的互信、經貿的依存、軍事的交流，還有文化上的相互吸引。

中國開放性地擁抱美國文化

對中國來說，這沒有絲毫的問題。美國是軟硬實力全球唯一超強，中國從未懷疑和挑戰過。即使是全球普遍看好中國的今天，對於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對華地緣上的搶逼圍堵，中國也予以克制；對於人民幣匯率和对美貿易順



■美國價值觀逐漸影響中國。

差，中方不僅穩健地升值，而且送給美國450億美元的大合同。在最新一期的《外交評論》雜誌中，中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司長樂玉成撰文指出，至少在未來20年內，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仍將「保持無可置辯」，中國政府應在自信和克制中保持平衡。

美國應學會欣賞中國文化

不僅如此，中國人對美國的軟實力也極盡推崇。好萊塢(港譯荷里活)大片，是中國人的最愛，在中國百億票房中，十幾部好萊塢大片幾乎抵得上數百部國產電影的市場份額；美式快餐、飲料、遍佈中國城市、鄉村；以蘋果為代表的美國高科技信息產品，成為年輕時尚的象徵；中國精英階層的孩子，美國是最佳的遊學地……美國文化產品，不僅在華創造着不菲的經濟利益，還裹挾著美國價值觀，深刻影響着中國年輕一代。有趣的是，按照亨廷頓文明衝突的理論，儒家文明的中國對基督教文明的美國並未產生衝突，而是開放性地擁抱吸收。而和美國屬於同質基督教文明的法國，對於好萊塢電影的輸入，則視為「文化侵略」。

這說明，中國對於美國的承認與欣賞是全方位的，是發乎外及於心的。有人形容中美關係是夫妻關係，那中國就是誠心誠意的妻子，而美國則是充滿猜忌之心的丈夫。夫妻之間，只有欣賞對方的優點，發現對方的魅力，雙方關係才會和諧。「軟實力」概念的首創者約瑟夫·奈指出，中美彼此增加吸引力可減少誤會。而美方眼中緊盯的是中方的硬實力提升，忽略的是中國的軟實力，尤其是文化的吸引力。研究中美關係的中國學者閔學通曾對中美文化吸引力做過深入的研究，中國的文化總體吸引力約為美國的8.6%。但這不是美國自大自戀的理由，而是發現中國文化魅力的契機。

從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和廣州亞運到在全球開辦孔子學院，再到自己推出國家形象宣傳片，中國積極地展示着自己的文化，釋放着自己的魅力。若美國真心觀察中國，會發現中國文化的開放、博大和和平。很遺憾的是，美國政界和媒體對中國的努力要麼是誇張的驚呼，要麼是浮濰的讚歎，最終還是歸於中國表現自己的強大。普通美國人，也對宋祖英的演唱會報以熱烈的掌聲，也歡迎張藝謀中西合璧的歌劇《秦始皇》，但那是對中國藝術的好奇而不是真正的欣賞。

如果美國像中國那樣關注對方，就會發現中國文化的內核裡有的是中庸、寬容，而絕少殺伐、霸道。禮、智、仁、義、信的國家文化傳統和溫、良、恭、儉、讓的個人文化修養，傳習了數千年。儒教文化盛行的中華帝國時代，憑借文化的吸引力而不是武力的征伐，贏得了亞洲各國的欽敬誠服。

「應該讓『中美國』繼續下去」(「中美國」(chiamerica)概念的創始人弗格森語)；美國有必要學會欣賞中國文化。用一顆真誠的心，就能化解中美兩國矛盾，還有比這更好的嗎？

先富助貧 共享繁榮

方潤華

雲泥鴻爪

憑藉改革開放之東風，中國的富豪階層迅速壯大，消費豪華更「享譽」全球。據去年公佈的《2010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內地千萬富豪達87.5萬人，其中億萬富豪5.5萬人，十億富豪1900位及百億富豪140位，初步實現了鄧小平先生有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方針與設想，實可喜可賀。然而很多人卻忽略了鄧小平原話之精髓：「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由此可見，以「先富」幫「後進」達致「共富」，才是鄧小平思想的終極目標，多年來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才脫穎而出的富豪們，值得為此深思反省。

如今中國的經濟成就一日千里，舉世稱頌，然而無可否認的是貧富懸殊亦如影隨形，不斷加劇，衡量社會分配公平指標的基尼係數已衝破0.4警戒線，達至0.5之危機水平，可見鄧小平先生的理想目標並未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尚遙遙無期。

當然財富乃辛勤所得，要慷慨解囊捐出才能免有些捨。改革開放之路歷經無數風浪，能於激烈競爭中打拚成為富豪非易事，風光的背後都蘊含著一段段辛酸奮鬥史。縱觀內地富豪，大多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過艱苦的歲月，很多人曾從事農耕、畜牧、推銷或工人等基層工作，他們憑藉聰明才智及堅毅意志，把握機遇，艱苦創業，奮發拚搏，終成大業。

人生在世，成功是無數人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成為富豪就算成功了嗎？確是見仁見智。富豪只是代表一個人財富的多寡，若未能對社會作出有益貢獻，以部分人善妒之本性，招來的「仇富」將多於讚賞。相反，若富而好仁，樂善好施回饋社會，扶貧濟困造福人群，則能得到人們的敬重與愛戴，獲得普世的尊崇。

李嘉誠先生乃華首富，亦堪稱首善，他同樣是從貧困中努力奮鬥走上成功之路，多年來他的事業成就名揚天下，慈善工作亦獨佔鰲頭，堪稱為富好仁之楷模。華人社會福蔭子孫觀念根深柢固，不必強求「裸捐」，但若能像李嘉誠先生視慈善基金會為第三個兒子，將三分一財富用於行善，對社會定有極大裨益，若有多一些富豪仿效，則社會風尚必將煥然一新。

狂買奢侈品並不代表其真的富有，也不是致富後的唯一出路，「拚命賺錢，盡情享樂」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沒錯，但務必念及身邊無數未能得享經濟成果的窮苦同胞，「處富貴地，要矜憐貧窮之酸辛」是中國古老之傳統，只有發揚互幫互進精神，才能達致「富而無驕，貧而無怨」之社會和諧局面；也只有實現全中國人民共同富裕，鄧小平先生才能壯志得酬，含笑九泉，中華民族才稱得上真正的復興與強大。